

doi: 12.3969/j.issn.1672-0598.2014.04.022

方法论意义上的《中国之欧洲》

——兼及比较诗学研究的一种启示*

杨 果

(天津外国语大学 比较文学研究所, 天津 300204)

摘 要:艾田蒲(René Etiemble)的比较文化巨著《中国之欧洲》具有独特的方法论体系。在语言层面上,这部著作表现出形象性与思辨性的高度统一;逻辑层面上则以归谬法的使用为特色;论述策略上忠实体现了作者提出的“比较诗学”的特性——历史考证与审美思考的结合;结构层面上则倾向于“起—承—转—合”的完整运思。这一独特的方法论体系或许可以为比较诗学的研究提供一种启示:既然从意识层面入手解决各类“中心主义”、民族主义困难重重,从学理层面进行的辨析又常常陷入曲高和寡的窘境,那么,以方法的运作清除偏见所赖以滋生的土壤,或许可以为我们带来一种真正清醒、公正而又不失美感的比较诗学。

关键词:方法论;《中国之欧洲》;比较诗学;艾田蒲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14)04-0141-09

在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界,艾田蒲(René Etiemble)^①无疑是一位举足轻重的学者,也是成功地融作家与学者两种身份于一身的一位博学之士,在创作和研究两个领域都做出了重大成绩。^[1]尤其是1988—1989年出版的两卷本《中国之欧洲》(*L'Europe Chinoise*),在中欧文化交流史上竖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出版不久即被誉为“一部‘比较文化巨著’”,^[2]引起了国内学界的高度重视。自该著作首个中译本1994年问世至今,十数

年间,已产生了三个译本、一部相关论著和数篇重要论文。^②不过,这些研究大多侧重从文化交流的角度论证《中国之欧洲》的意义,只有个别学者对其方法论意义进行过一定程度的阐发。^③笔者认为,艾田蒲在其著作中所展现的广阔的研究视野、博大的学者胸襟和公正的学术立场,自与其本人的识见与学养密切相关,但或许多少也得益于其所使用的学术方法。因此,本文的首要目标,便是尝试着从方法论的角度对这部博大精深的著作

* [收稿日期]2014-01-15

[作者简介]杨果,男,湖南汨罗人;天津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比较诗学研究。

① 国内学界关于Etiemble的汉语名有多种译法,如本文明后参考文献中出现的就有“艾田蒲”“艾田伯”“安田朴”等。根据钱林森教授的说明,“艾田蒲”为Etiemble为自己所取的中文名,本文中《中国之欧洲》的引文也全部引自许均和钱林森教授的中译本,故本文在行文中统一采用“艾田蒲”这一译名。但为了读者查阅文献的方便,参考文献中的不同译名则不加改动。

② 三个中译本依次为:[法]艾田蒲.中国之欧洲(上下卷)[M].许均,钱林森,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1995;[法]安田朴.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M].耿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法]艾田蒲.中国之欧洲(上下卷)[M].许均,钱林森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本文主要参考的是第三个中译本。相关研究专著为:叶潇.自由中国——伏尔泰、艾田蒲论“中国礼仪之争”[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

③ 在笔者搜集到的资料中,这个问题似乎仅钱林森教授有过研究,详见后文的相关讨论。

进行一番梳理。

一、“熟悉的陌生”^①:《中国之欧洲》的方法论体系

从方法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之欧洲》,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即作者在这部著作中所使用的方法往往并不是什么发明创造,反倒都是为我们所习见熟知的。可是,经过作者在不同层面的重新组合与独到运用,一个全新的方法论体系竟得以形成,并散发出某种独特的“陌生”味道来。

(一)形象性与明晰性的统一——语言层面的《中国之欧洲》

1.形象性方法

何谓“形象性”?《辞海》对此作出了较为全面的解释:

艺术作品用形象的特殊形式把握现实和表现思想感情时所具有的具体、可感、生动、能唤起人们的感性经验和思想感情的属性。有时也指不属于文艺性质的讲话或论著中某些生动、具体的描述。^[3]

的确,长期以来,“形象性”在文学研究领域一般专指文学作品中生动、具体、传神的语言刻画。瑞士文论家沃尔夫冈·凯塞尔甚至认为文学语言与理论语言最大的区别就是形象性:“同理论的语言相反,文学的语言用形象性来标志自己。”^[4]然而,随着具有作家、理论家“两栖”身份的学者的增多,尤其是在20世纪以来不少国外汉学家的理论著作中,形象性也开始成为其语言层面的著述特征之一。^②那么,语言是如何实现自身的形象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曾以举例的方式

回答了这个问题:

“有个小银圆落到地上”,这种句子不够好,应该写成:“有个小银圆,从桌上滚了下来,在地上叮叮当地跳着。”^[5]

显然,就表达方式而言,陀氏所举的修改前的句子仅为单调的叙事,而修改后的句子在表达方式上变成了生动地描写,再加上同时使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从而激发读者强烈而鲜明的阅读想象。这个例子很容易令我们想起刘勰所说的“壮词可得喻其真”(《文心雕龙·夸饰》),以及梅尧臣所谓的“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欧阳修:《六一诗话》)。总而言之,正是各类修辞方法以及各种描写手法的运用,确保了语言的形象性。

或许是因为成书于讲稿,^[6]又或许是得益于作者的作家身份,《中国之欧洲》在语言层面同样出现了大量“生动、具体的描述”。而至少有两种方法为这部著作的形象性作出了贡献,那就是比喻修辞和戏拟(parody)手法的运用。

(1)比喻

比喻在《中国之欧洲》中的运用虽称不上随处可见,却总是达到一针见血的立论效果,为艾田蒲锋利的思想包裹上一层形象的外衣。如上卷第七章将马可·波罗针对中国某个村寨——该村寨具有向外地人“推荐”本村年轻女子的习俗——而发的调侃性议论称为“有几分强盗味儿的默契”^[7],下卷第十四章谈论中国纪年表时则感叹:“中国的历史披着一层历史的外衣,同样是由神话编织而成。”^[8]应该说,作为一种写作技巧,比喻溢出文学创作的领域而进入研究论文之中已经不是新鲜事了——同为汉学家的宇文所安

① “熟悉的陌生”借自俄国文论家别林斯基(Billingsky)用以形容“典型”的“熟悉的陌生人”(familiar strangers)概念。别林斯基在《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一文中曾写道:“在真正有才能的作家笔下,每个人物都是典型;对于读者,每个典型都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见[俄]别列金娜·别林斯基论文学[C].梁真,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8:120.本文对这一术语的借用意在突出艾田蒲“以旧为新”的方法论建构策略。

② 以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为例,在其出版的一系列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专著中,形象性几乎成为了最为鲜明的特征。作者本人将其称为一种“新型论文”(new essay),其最为突出的代表作即为《迷楼》:该著中甚至连整个著作结构都采用了一种隐喻修辞的方式。可参阅Owen, Stephen. *Mi-Lou: Poetry and the Labyrinth of Desire*[M]. Cambridge: Harvard UP, 1989. 中译本参阅[美]宇文所安.迷楼——诗与欲望的迷宫[M].程章灿,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

(Stephen Owen)在这一点上可以说登峰造极。然而艾田蒲显然没有宇文所安创造“新型论文”的野心,^[9]所以《中国之欧洲》中的比喻虽然随处可见,却总是给人一种点到即止的节制感。比如上卷第十三章谈到不懂汉语的传教士公然传播有关中国的谬误信息,作者不禁感叹道:“可怜的真理往往是这样传播的,负载着过去或未来的错误,衣衫褴褛,面目全非,难以辨认。”(上卷 141)^①一个严肃的话题却通过如此形象的语言表述出来,其本身内含的巨大张力足以推动读者跨越修辞鉴赏层面,而进入一个更深层次的文化反思。上卷第三章在介绍玄奘西游时的慨叹则更具代表性:

我们这些尤利西斯,具有探险的意愿,甚至不惜闯入独眼巨人的老巢,但是,我们对亚洲的了解绝不仅仅是得之于我们的这一意愿。中国人也同样作出了很多努力,向我们贴近。(上卷 26)

对于熟知荷马传统的读者来说,“尤利西斯”的比喻无疑是生动而亲切的。但作者于比喻方法并不“恋战”,引文的后半段立即以简洁明了的语句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最大程度地避免了读者因“沉溺”于比喻本身而迷失主题的“危险”。

(2) 戏拟

“戏拟”是英文术语“parody”的对应译名,也有学者将其译为“戏仿”“滑稽模仿”等。《牛津英语词典》将其解释为“散文或诗歌中的一种写作方法”,其特征就在于“以一种造成荒谬效果的方式模仿一个或一类作家,尤其是将其运用于不相协调的主题之间”。^[10]美国文论家吉尔伯特·哈特则认为“戏拟是讽刺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是通过扭曲和夸张来进行模仿,以唤起人们的兴致、嘲弄和讥讽”,并将其划分为“形式的”和“内容的”两种主要形式。^[11]简单地说,所谓戏拟即是以模仿的方式改造对象,从而达到一种新的、富于戏谑性的表达效果的手法。从语言表达方式的角度来看,戏拟属于典型的描写策略之一。

和比喻一样,戏拟在许多理论著作中也时有出现,其中就包括艾田蒲的著作。不过,与作者对比喻的节制性使用不同,戏拟手法在《中国之欧洲》中的运用却相当普遍——在这套两卷本的著作中,艾田蒲几乎对自己的每一个论敌都使用了此种方法,哈特所谓的“形式的戏拟”与“内容的戏拟”在该著中均有出现。比如,艾田蒲有时在想象中戏拟对手的情态:“阅读了勒诺多所提供的《游记》版本后,皮埃尔·培尔不禁磨尖鹅毛笔,就我们所论及的主题撰写了一篇学识渊博、且又蕴含哲学意味的论文,以加重其《历史批评辞典》的分量。倘若他还在世,呈现在我眼前的必定是此情此景。”(上卷 34)有时则通过戏拟对手的语言而揭示其虚伪、可笑,如谈到马可·波罗的《游记》带给欧洲一个全新的中国形象时对天主教众的揶揄:“这一切足以引起天主教世界的不安:如此自由,岂不等于放纵!”(上卷 51)有的时候,戏拟论敌的口吻并进而揭示其自相矛盾之处也是艾田蒲所乐于使用的方法:

可见,在伊丽莎白时代和后来的一段时期,中国人既是乌托邦里的人,人间天堂里的人,也是(尤其是)不知道真正上帝的民族,所以,他们的文明毫无价值。

我觉得上文已经说清楚,当伊丽莎白时代的剧作家提到中华文明某些别致的特征时,他们无不在就当时向西方人提出的重大问题表明自己的态度:一个如此文明、艺术如此繁荣的民族,人们不得不将它与奥古斯特时代的罗马相媲美,可那儿怎么又会是一块信奉假神、崇拜偶像的土地呢?(下卷 83)

“他们的文明毫无价值”显然是对论敌口吻的戏仿,然而艾田蒲并不止步于此,而是进一步对以宗教教条评判异域文明价值的做法给予了无情的嘲笑。戏拟的广泛运用不仅有效打击了论敌,而且或多或少地虚构出一种论战的当下场景,从而使全书的语言更加形象而生动。

① 为避免冗赘,此处及下文在引用《中国之欧洲》中译本时均随文标注卷数和页码,不再另注详细出版信息。

2.明晰性方法

如果说形象性常常为语言带来一种“美”的效果,那么明晰性则更多地赋予其“真”——亦即表达的准确性——的保障,二者合而为一往往造就文章之“善”。“美”和“真”之间并不必然成正比,例如李白《望庐山瀑布》一诗中的名句“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是语言“美”的典型,却恐怕并非“真”的佳例。前文提及的宇文所安,虽然在语言的形象和“优美”方面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与赞誉,然而就连作者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其语言的“游戏笔墨”和“跳跃性”给读者、尤其是异文化的读者所造成的理解障碍。^[12]与之相反,《中国之欧洲》语言的形象性却并没有削减其表意的明晰性。这或许得益于其作者本人强大的理性思维——面对着数个世纪以来各类情绪化倾向严重的历史文献,艾田蒲始终保持着冷静的头脑和公正的立场,紧扣论题谨慎取证、细致分析;同时也可能受惠于作者所使用的相关修辞方法。而在这些方法中,最为突出的两种便是对比和反语。

(1)对比

对比又称“对照”,它可以说是我们最为熟悉的修辞方法之一。其特征在于“把两种对立的事物或者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方面放在一起,相互比较”。由于对比的运用“或使对立事物的矛盾鲜明突出,揭示本质,给人深刻启示;或使事物对立的两个方面互相映衬,相得益彰,给人深刻印象”,^[13]这一手法便常常有助于增强语言表达的清晰与准确。

通观《中国之欧洲》,对比方法的使用频率恐怕是最高的。这部杰作的作者具有深刻的比较意识,而对比的广泛运用便是此意识最鲜明的表现。

在整部著作的开篇,我们便看到了对比手法的运用:作者在介绍蒙田观点的基础上引出了16世纪末中国和印度在西方世界影响力的对比(上卷2);在上卷第六章中,我们发现了马可·波罗东游与玄奘西游的对比(上卷63);下卷的第一章中我们又发现了耶稣会士和罗马教廷对中国礼仪的态度的对比(下卷7);而整部著作也伴随着欧化之中国与欧洲对比而结束。(下卷

290)需要指出的是,对比的运用绝不是静止或机械的,它们往往具有鲜明的价值立场——正如下述引文所表明的那样:

如果说对通行的所有观念都表示怀疑,永远是明智的做法的话,那么,要想有个正确的思想,仅仅采取停滞的观点,也是不够的。在我们的国度,有人夸大了中国人的德行,而在这一意义上,索邦神学院对耶稣会士的书进行批判,而不是谴责,当然是有一定道理的,对此,大家自然也都明白。但是,仅仅阅读中国的小说或戏剧,浏览一番中国的历史,就想从中认识到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各个地方,“人大多是软弱、无能、堕落的”,那也是不够的。

这段引文中出现了两个对比:“停滞的观点”与“正确的思想”的对比,无端夸大中国人“德行”的做法与根据有限材料贬损中国人的做法的对比。前者体现了作者对于摆脱他人干扰、以发展的眼光探求真理的倡导,后者则表明了作者在中西文化交流史考察中的公正立场和审慎态度。——显然,这里的方法并不是剥离于思想的。

(2)反语

当对比过程中衍生的强调或辩论意味进一步增强时,反语的出现便顺理成章了。所谓“反语”,就是“说反话”,常有“讽刺反语”(表示讽刺和嘲弄的反语)和“愉快反语”(以调侃而达到轻松、诙谐效果的反语)之分,^[14]也就是《中国之欧洲》的译者之一许均所概括的“正话反说”与“反话正说”这两大类型^[15]的结合。

先看“正话反说”的例子。上卷第五章在论及《马可·波罗游记》的价值时这样写道:

如果他的本意是想在中国思想或文学方面给我们提供教益的话,那么,他的书的价值就会大大降低;因为他给我们提供的是有关蒙古人统治的中国的政治、宗教,尤其是经济生活的详细介绍,他对蒙古人的了解,无愧于20世纪的博学者们给予他的信赖。(上卷

69)

乍读之下,引文的前半句似乎是在批评马可·波罗的著作,然而后半句的评论使我们恍然大悟而不禁解颐:作者此处的真实意图原来是要给这位游历家以赞美!这样的“愉快反语”一方面使文章波澜起伏,富于吸引力,另一方面也通过引起读者反思的方式清晰传达了作者本人的观点和意见。

再看“反话正说”的例子:

美男子菲利普为了掩盖驱使他迫害犹太人的吝啬与贪婪的本性,设置了臭名昭著的礼仪罪,直至今日,这个罪名仍然作为人类的耻辱残存在大多数反犹太主义的破书之中。美男子菲利普声称,这样对待犹太人,是为了惩罚他们,因为他们每年在神圣的星期五都要在地窖中让一个基督教儿童受难。(下卷232)

菲利普是法国皇帝,因长相英俊而得到了“美男子”的美称,然而此处所谓的“美男子”显然是充满批判、否定意味的,属于典型的“讽刺反语”。引文中提及的菲利普的行为不仅凶残、贪婪,而且无知、无耻,这样的所作所为乃是不折不扣的“丑”——恰恰是“美”的反面。艾田蒲在这里连续两次重复“美男子菲利普”,为的正是突出其名不副实的称号与其肮脏丑恶的灵魂,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的鄙夷与唾弃。

这样,通过语言层面的大致梳理,我们发现《中国之欧洲》语言的形象性和明晰性是与以下四种方法的使用分不开的,即:比喻、戏拟、对比和反语。需要注意的是,该著中这些方法的运用往往互相配合,水乳交融。正是这些各司其职而又相融交汇的方法的运用,使得这部巨著在语言上既不失理趣,又摇曳生姿,散发出一种特殊的魅力。

(二) 反证法的大量使用——逻辑层面的《中国之欧洲》

当我们越过语言层面,深入到《中国之欧洲》

的逻辑层时,其方法论的另一大特色便展现在眼前了:这就是反证法的大量使用。与崇尚直接推论的学界主潮有所不同,艾田蒲同样钟情于反证法,并在其著作中多次使用。具体到《中国之欧洲》来说,其运用最多也最为得意的是归谬法,其次为穷举法。

1. 归谬法

说归谬法是《中国之欧洲》的作者最为“得意”的方法,是因为它是艾田蒲在这部著作中唯一夫子自道的方法:

一位研究中国礼仪之事的史学家,曾正确地高度重视那部著作,1751年之后又发表了该著作的几个校订和增补本,就算他(指伏尔泰——引者注)是出于一种难以置信的不幸或疏忽,在1740年没有读到这次出使的记述,可他怎么会在1753年或1768年重版时还不知道它呢?大家很清楚我用的是归谬法来进行推理。(下卷8)

此处的议论是针对伏尔泰撰写《路易十四时代》时只字不提梅扎巴尔巴使团的情况而发。既然伏尔泰是一个“酷爱直接获取的、而且尽可能不留情面的材料的人”(下卷8),那么他就不可能不知道维阿尼神甫有关该使团的记载——更不用说该《游记》还有“几个校订和增补本”,而伏尔泰居然在著述中对此不著一词,这就只能证明伏氏别有用心了。——归谬法的使用的确能够更加有力地说明问题!再看一例:“总而言之,在中国讲究‘公平合理’,‘任何人都不会对他人失信,尽管他们的交易并不借助于证人或立誓形式’。由此看来,勒诺多是很不谨慎的:在一个连做交易都以道德为保证的国度里,我确实看不出在哪些方面对‘哲学家们’的事业会产生不利因素。因为把话说穿了,既然这个中国不信基督教,那她必定是既不讲道德也不讲法律的;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上卷39)根据忠实的基督徒勒诺多的“理论”,凡是不信基督教的国度就是不讲道德不讲法律的,而中国正是他所说的这类国家之一。然而又是这同一位勒诺多,在阐发阿拉伯人的

《游记》时说中国是一个“公平合理”、对任何人都守信的国度。——这一逻辑上的荒谬恰恰证明了勒诺多言论的谬误。

2. 穷举法

在《中国之欧洲》的逻辑方法中,有时也会出现穷举法的身影。如下卷对孟德斯鸠的批判:

同一个作者,一会儿给中国套上暴政的模式,一会儿又给中国套上君主立宪的模式,此外又承认中国拥有弹劾机构,而正常情况下,弹劾又只有在民主政体下才起作用,难道这不让人觉得困惑吗?时而把恶劣的君王,亦即把暴君的生动典型作为理论依据,时而又把自己的那套理论建立在中国人对仁君的看法上,这不正是孟德斯鸠的所作所为吗?(下卷 27)

通过穷举孟德斯鸠关于中国政治的种种解说,辨析其论说中的自相矛盾之处,从而有力地论证了孟氏相关评论的逻辑混乱、不足为凭。必须说明的是,穷举法在《中国之欧洲》中的使用也并不是偶一为之的,上述引文的同一章中,作者在批判孟氏关于中国人口解释的荒谬性时也使用了穷举法。(下卷 30-31)

当然,归谬法仍然是这部著作更为常用的逻辑方法。不过,反证法的运用在《中国之欧洲》中虽然比重较大,却仍然是作为直接推论的补充而出现的。或许人类的思维习惯的确使人更倾向于直接推论,但艾田蒲的尝试向我们证明:反证法的合理运用在增强文章说服力方面是能够收获奇效的。

(三) 历史考证与审美思考的融合——技术层面的《中国之欧洲》

在《中国之欧洲》的译序中,钱林森抓住艾田蒲在《比较不是理由》一文中“把历史方法和批判精神结合起来,把考据和文章分析结合起来,把社会学家的谨慎和美学理论家的勇气结合起来”的倡导,将其视为《中国之欧洲》“方法论上的主要特色”,^[2]这是极有眼光的。虽然《中国之欧洲》是一部比较文化著作,但其使用的方法与作者一贯主张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却是一致的。不过这

种“考据”和“文章分析”的方法主要是在论证技巧的层面发挥功效,其中前者的表现形式为史证,后者则以史评的面貌出现。

1. 史证

《中国之欧洲》的一大特色就是资料的宏博,所以史证方法是贯穿全著的。但艾田蒲对历史考证方法的使用有两大特色:一是注重细节的挖掘,如下卷第四章在清理欧洲“中国化”的资料时,从对茶和瓷器的简短记载中发现了中国影响的有力证据,(下卷 41)第六章甚至直接呼吁人们重视历史资料的细节;(下卷 63)二是体现出一种极为广博的文化视野,这一方面表现为纵向的“古今之证”,另一方面则体现在横向的“中西之证”上。

(1) 古今之证

所谓古今之证,是指艾田蒲在对某个问题展开分析时,往往习惯于将该问题置于历史的沿革之中加以考察,表现出强烈的问题史意识。比如在分析孟德斯鸠对中国的论断为何那般自相矛盾时,艾田蒲并没有将罪过全部推到孟氏一人头上,而是通过对卡蒙斯、马可·波罗、罗杰·培根和蒙田所犯的类似错误进行历史追溯,从而证明了孟氏之误更多乃是源自于历史而非其个人。(下卷 32)

(2) 中西之证

所谓中西之证,是指艾田蒲在求证某个问题时,很少孤立地考察其在一个文明中的表现,而是始终保持开放的胸襟,进行跨文化的、双向的历史观照。如上卷第五章谈到欧洲对于蒙古人入侵的恐惧时写道:

在人们的集体记忆里,蒙古入侵的“可怖”与恐惧难以磨灭,可是同样残酷的维京人的侵略却早被抛到脑后,因为这些维京人也是“白”人,然而,多血质的蒙古人的大汗却是天底下君王中最强大的一位,拥有最强大的人力与物力,且最为宽容、最为好客,当人们得知这一切时,该是多么震惊!(上卷 50)

通过同时并举欧洲历史上遭受过的东、西方世界的两次残酷入侵,指明欧洲人对蒙古人的敌意超越了历史所能解释的范围,而应归属于心理

层面的异族恐惧——这一恐惧显然主要产生于欧洲人的民族偏见,而不仅仅是历史的恩怨。

2. 史评

当艾田蒲针对大量历史资料和考据成果进行美学思考时,他便在《中国之欧洲》中留下了大量的史评文字。这些文字就其与全书主旨的关系而言可细分为两类,即与主旨契合的“就事论事”和溢出主旨的“宕开一笔”。

(1) 就事论事

这类评论在《中国之欧洲》中俯拾可见,如“最为重要的影响往往是最不明显的”(上卷 97)、“谬误往往是通向真理的道路”(下卷 275)的著名论断等。而以下这段文字也是书中极为精彩的史评之一:

弗西荣知道,有益的和真正的影响,往往是当我们消化了一块羊排或两打牡蛎时所接受的影响。正如继歌德之后,瓦莱里所说的那样,狮子是由被消化的羊构成的。同样,罗马建筑术的一部分是由东方,由被消化吸收的东方构成的。(上卷 101)

(2) 宕开一笔

也许是脱胎于讲稿的缘故,《中国之欧洲》的史评中溢出主旨的部分不少。除去少数确为闲笔、价值不大之外,^①许多溢笔却似闲非闲,成为本书史评中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例如上卷第一章在论述完商品与价值观的必然联系之后,以括号加注形式出现的关于酒瓶塞和葡萄酒的阐发。表面看,这是一段即兴发挥,与主题相距遥远,然而最后那句“请记住圣贝尔纳唐修女院修女们那首《蜡封美酒》中的那段唱吧:不然,再过一两个世纪,这段歌曲就听不懂了,将因此而标志着我们文化的一次失落”(上卷 8-9)却又给我们以暗示——作者此处的感慨其实仍是因商品与民族价值观的紧密联系而发的。

通过“史证”和“史评”这两种方式,艾田蒲在

论证技巧层面实现了历史考证与美学思考的结合,这的确有其独到之处。必须指出的是,即便是在略显感性的史评中,艾田蒲同样立场鲜明。“评”并不意味着不“论”,在艾田蒲看来,那种模棱两可的论证无疑是一种“混淆”,应当坚决予以反对。(上卷 202)

(四) “起—承—转—合”的追求——结构层面的《中国之欧洲》

“起—承—转—合”原为中国古典诗歌结构法,元代诗人范德玠在《诗格》中对其有具体解说:“作诗有四法:起要平直,承要春容,转要变化,合要渊水。”后来这一方法扩大至文章结构法的层面,成为文人墨客作诗为文时重要的运思法则。巧合的是,《中国之欧洲》在结构层面竟与这一中国特色的结构法则产生了呼应。

需要说明的是,此处所谓的“结构”是就《中国之欧洲》中各种研究主题的结构而言的。之所以以主题而不以章节为划分标准,是因为这部著作常常以多个章节的篇幅研究、阐释同一主题。通过对《中国之欧洲》中各类主题研究的整体考察,可以概括其通行的结构模式如下:

①列举代表(人或著作)→②正面(或反面)论述→③反面(或正面)论述→④价值判定并引出下一个问题

在这一结构模式中,第一、第四两个环节是基本固定的,分别对应“起”与“合”两个环节。第二、第三两个环节则恰好相反:当第二步进行正面论述时,第三步便进行反面论述;如果第二步进行的是反面论述,则第三步往往采用正面论述。——这恰好符合了“转”的要求。同时第二环节与第一环节具有承接关系,即是说,第二环节进行正面论述还是反面论述通常是由第一环节所决定的。

以上卷第五章至第八章关于马可·波罗的研究为例。马可·波罗的论题是在第五章后半段肯定了奥德利克·德·波德诺纳的《游记》之后引出来的,虽然艾田蒲对马可·波罗的《游记》使用

① 如下卷第十一章分析《中国孤儿》时对名为“Dieu”的先生的发挥,就可以说是作者的一时兴起。参阅[法]艾田蒲.中国之欧洲(下卷)[M].许均,钱林森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25.

了一个反讽——如上文所引,但本章中的评价还是以肯定为主,讽刺的意味尚未显露。作者甚至对马可·波罗的游记冠以“严肃的著作”“最严肃认真的介绍文字”的头衔。(上卷49)第六章在与高维奴神甫来华、玄奘西游事件的对比中继续肯定马可·波罗其人其书的正面价值,但也已经开始对其“轻信”的缺点进行轻微批评。(上卷60)进入第七章后,作者对马可·波罗的批判陡然增加:首先是对其关于伊斯兰教的偏见的批评——“没有任何睿智的表现,也没有丝毫的基督徒的仁慈”,(上卷69)接着开始严厉批评其“追求噱头有余而注重思想不够”。(上卷77)第八章开篇继续批判其“一点也不思考”和对中国哲学的冷漠无知,但最终还是肯定了他“给人以思考”的积极一面。(上卷82)结尾部分则由马可·波罗对锡耶纳绘画艺术的影响引出新的论题——“中国艺术与锡耶纳复兴”。显然,第五章后半部分和第八章后半部分分别对应“起”“合”两个环节,第六章的正面论述对应“承”的环节,而第七章、第八章前半部分的反面论述对应的则是“转”这一环节。在该主题的探讨过程中,“起—承—转—合”的整体结构应该说是非常清晰的。

二、《中国之欧洲》对于比较诗学研究的启示

对比较诗学领域、尤其是国内比较诗学界而言,艾田蒲已经成为了一座绕不开的大山,因为正是他最早预言了这一学科的到来:把这样两种互相对立而实际上应该相辅相成的方法——历史的考证和批评的或审美的思考——结合起来,比较文学就会像命中注定似的成为一种比较诗学。^[16]显然,艾田蒲所定义的“比较诗学”正是建立于方法的基础上的。这一观点提出于20世纪60年代,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学界对于“比较诗学”的理解恐怕早已不能为这一原初定义所涵盖,但这并不等于说它已失去价值。至少,我们从《中国之欧洲》这一巨著中看出了艾田蒲近30年来对方法的一贯坚持,也可以从其学术成就中发现其研究和著述方法本身的巨大价值。虽然我们可以说,是艾田蒲的作家天赋赋予了其超强的形象表达能力,是他哲人的慎思明辨赋予了其语言的明

晰性,是他的宏大视野促使其将历史与审美加以整合,是他广博的胸襟确保了其公正的学术立场。然而,倘若我们承认即便学术天才也离不开后天的有效训练的话,那么上述种种判断反过来是否也应该成立呢?至少在《中国之欧洲》这一著作中,我们可以作出如下推断:正是由于对比的大量运用,论著的明晰性得到了加强;因为戏拟、反语和反证法的使用,作者超越了单向思维的单调枯燥,而拥有了双向思维换位思考的活泼性与深刻性;历史考证和美学思考的结合加强了艾田蒲研究的可信度与启发性;对“起—承—转—合”这一完整运思过程的追求则给著作带来了系统性和缜密性。而且,与直接剖析作者意识或思想的做法相比,从方法入手的探索似乎反而距作者本人更为贴近。毕竟,天赋、哲思、视野、胸襟、识见等均不容易把握,而方法却总是有迹可循的。

所以我们认为,方法论研究在比较诗学中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有加强的必要。因为涉及意识形态与文化思想等问题,比较诗学界受各类中心主义、民族主义的冲击尤甚。虽然近年来情况有所缓解,但中国学人在国际对话中的困难与窘境却一直未能得到有效改善。而《中国之欧洲》恰恰在破除欧洲中心主义,批判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等谬误与偏见方面做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那么,像艾田蒲那样致力于建立一个较为完善的方法论体系,力争以方法的运作扫除种种偏见所赖以滋生的土壤,也理应可以为我们带来一种清醒、公正而又不失美感的比较诗学吧!

三、结语

《中国之欧洲》博大精深,可供研究的议题不少,本文选择的仅仅是其方法论体系的探讨。通过对其各个层面的方法梳理,我们发现《中国之欧洲》在方法论上的特色如下:语言层面上,作者一方面通过比喻和戏拟的运用加强了语言的形象性,另一方面又以对比和反语的使用增强了语言的明晰性,创造了独特的语言风格;逻辑层面上,以反证法的使用为特色,建立了以归谬法为主、穷举法为辅的逻辑方法体系;技术层面上着力实践作者融历史考证和美学思考于一体的主张,以史证和史评两种方法加以推行;结构层面上则以

“起—承—转—合”的追求确保运思的完整性和缜密性。这一方法论体系不仅有助于《中国之欧洲》的成功,也可以为当下比较诗学研究提供新的启示。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我们期待着一种更加成熟、有效的比较诗学方法论的建立——不仅期待它实现比较诗学新的学术突破,也期待它为真正实现国际比较诗学界的话语平等提供助力。

[参考文献]

- [1] 许均.追忆艾田蒲(代修订本序)[M]//艾田蒲.中国之欧洲(上卷).许均,钱林森,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 [2] 钱林森,译.序[M]//艾田蒲.中国之欧洲(上卷).许均,钱林森,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 [3] 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2304.
- [4] [瑞士]沃尔夫冈·凯塞尔.语言的艺术作品——文艺学引论[M].陈铨,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150.
- [5] 林泽生,黎伟东.中外名家论创作技巧[G].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364.
- [6] 钱林森.艾田蒲与中国文化[J].南京社会科学,1997

(6):56.

- [7] [法]艾田蒲.中国之欧洲(上卷)[M].许均,钱林森,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67.
- [8] [法]艾田蒲.中国之欧洲(下卷)[M].许均,钱林森,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61.
- [9] [美]宇文所安.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M].郑学勤,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
- [10] OED Second Edition on CD-Rom [DB/CD]. Oxford: Oxford UP, 2009.
- [11] [美]吉尔伯特·哈特.讽刺论[M].万书元,江宁康,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58-59.
- [12] [美]宇文所安.迷楼——诗与欲望的迷宫[M].程章灿,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
- [13] 唐松波,黄建霖.汉语修辞格大辞典[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0:252.
- [14] 王希杰.汉语修辞学(修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96-299.
- [15] 许均.译后记[M]//艾田蒲.中国之欧洲(下卷).许均,钱林森,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92.
- [16] [法]艾田蒲.比较不是理由[C]//艾田伯.比较文学之道——艾田伯文论选集.胡玉龙,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42.

(责任编辑:杨 睿)

Etiemble's L'Europe Chinoise from a Methodological Perspective

——A Kind of Its Revelation Based on Comparative Poetics Research

YANG Guo

(Institut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Tianjin 300204, China)

Abstract: There is a unique methodology system in René Etiemble's masterpiece of comparative culture, L'Europe Chinoise, which showed us a high unity of imagery and speculation in its language, which preferred to reduction to absurdity in its logic of demonstration, at the same time, which faithfully embodi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parative poetics, as the author predicted in an essay before, in combination of historical examination and aesthetic thought in its expounding strategies, and which demonstrated a whole four steps of Chinese regulated classic writing, elucidation of the theme, connecting a link between the preceding and the following, transition to another viewpoint and summing up in its structural level. This unique methodology system may provide a kind of revelation for the research on comparative poetics; overcoming the difficulties in ideological prejudice brought by all kinds of centralism or nationalism, but frequently entering into the embarrassed situation too highly minded to be popular in the discussion in scientific knowledge, then, maybe the objectivity and regulation of the methods can help us overcome prejudice in our studies and then bring us one kind of exactly sober and impartial comparative poetics full of aesthetic feelings.

Key words: methodology; L'Europe Chinoise; comparative poetics; René Etiemble